

邓小平共同富裕观初探

张凤华

消灭贫穷,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及实践价值。

—

邓小平的共同富裕观即邓小平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什么是共同富裕和如何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系统工程根本看法和观点。概括起来,它主要包括下面三个基本观点:

1.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目标

如何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是一个极为敏感同时又经常困扰人们思想认识的重大问题。对这个重大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选择一条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邓小平一贯坚持从生产力和人民富裕角度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的思考是基于改善人民生活的现实需要,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越性之一,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1978到1992年的14年间,邓小平强调共同富裕问题则是围绕着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展开的,是从社会主义本质出发来思考共同富裕问题。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并吸取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经验,特别注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反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针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不顾生产力现实水平,片面强调生产关系“大过渡”及上层建筑领域大变革,从而使生产力发展滞缓、人民生活改善缓慢、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不能充分显现的严峻事实,邓小平开始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冷静地估计了形势,考虑今后的路怎么走。”“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基于此,邓小平在70年代中期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就批判了“四人帮”所谓“贫穷的社会主义”。80年代末,邓小平在领导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又进一步总结了改革开放后的新经验,更加坚信:“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因此,中国绝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虽然可以使少数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的生活富裕的问题。1990年,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在科学区别社会主义与“假、大、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邓小平将社会主义本

质界定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把共同富裕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并使之居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核心地位，从而赋予共同富裕以深刻的含义。其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技术手段和物质基础，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保障，共同富裕是目标与归宿。这就科学地解决了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2. 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实现共同富裕。那么如何才能尽快地发展生产力，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呢？邓小平以彻底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和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胆略，创造性地提出了让“部分先富”，进而带动大家实现共同富裕的构想，指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其依据如下：

(1) “部分先富”是对平均主义反思的产物。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提高。但是，由于我们缺乏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懂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以及由此而规定的经济利益关系不可能使人们同时、同步、同等程度的富裕，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从而抑制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致使“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早在1975年，邓小平就指出：人的贡献不同，在待遇上应当有差别。1978年，他又严厉地鞭笞了“干和不干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在此基础上，他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劳动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并指出：“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

(2) “部分先富”也是按劳分配原则实施的结果。分配方式服从于生产方式，在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不是很高，物质财富也不够丰富，劳动还是一种谋生手段，故在个人消费品分配上，“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⁴⁰由于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有大小之分，那么劳动者提供给社会的劳动成果必有多少之别，因而劳动报酬不可能完全相同，必然会拉开相应的差距，故我们“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方由于多劳多得，先富裕起来。”⁴¹这是现阶段公有制在个人收入分配实现方式上所呈现的历史特点。

3. “部分先富”不会导致“两极分化”

“部分先富”必然存在贫富差距，这种差距拉大会不会导致“两极分化”呢？邓小平说：“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级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⁴²为什么呢？

(1) 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防止“两极分化”的根本保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所谓“两极分化”是指由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及竞争规律的作用，使社会呈现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阶级分化趋势。公有制的建立，消除了阶级剥削的根源，劳动者具有平等的劳动权利和义务，也有平等地分享其劳动成果的权利，这就从根本上防止了“两极分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存在非公有制经济成份，但公有制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中居于主体地位，决定了占主体的分配方式是按劳分配，劳动者之间在能力（体力和智力）上的差别毕竟有限，因而在实行按劳分配的条件下，个人收入的差别不会过分拉大，不会造成两极分化。故邓小平说：“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⁴³“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⁴⁴

(2) 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可以防止“两极分化”。邓小平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⁴⁵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全体人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通过宏观经济调控，借助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积极有效地扶持和支援贫困落后地区发展经济，摆脱贫困，逐步走向富裕。

至于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邓小平认为不能急于求成，他十分慎重地用“要研究”三个字表达了对这一问题的关心与重视。他说：“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⁴⁶

综上所述，邓小平科学地解决了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提出了“部分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构想，从而形成了科学的共同富裕观。

二

邓小平共同富裕观的创立，既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又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1. 从理论方面看, 邓小平的共同富裕观是对马克思、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富民思想的丰富与发展

使劳动人民政治上获得解放, 经济上实现共同富裕是马克思、恩格斯毕生奋斗的目标, 但二位先哲深深懂得“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⁴⁷ 故在论及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时, 他们并未象庸俗社会主义者那样抽象地谈论“平等的权利”、“公平的分配”。他们敏锐地看到“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 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 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⁴⁸ 因而,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 便合乎逻辑地使“两极分化”失去存在的基础, 但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制约, 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只能实行按劳分配。由于人们素质有高低, 负担有轻重, 必然存在贫富差别。这里我们看到,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按劳分配的论述实际上蕴含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部分先富”的思想。

但是, 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实践中, 富裕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并未很好地解决, 在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上也存在不少误区, 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 提出了要使“全体成员”“富裕”的思想。他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指出:“社会主义不是要大家贫困, 而是要消灭贫困, 为社会全体成员建立富裕和文明的生活。”但在迅速推行工业化的实践中, 为了筹集工业化所需的资金, 斯大林主张农民除缴纳捐税外, 还应承受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尽管他的初衷是工业发展了, 可逐步降低从而最终消灭剪刀差。然而, 在苏联工业化实现后, 这一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对农民过多的剥夺妨碍了共同富裕的实现。同时, 在工业化的进程中, 斯大林对轻工业、农业发展重视不够, 使农业生产长期落后于工业生产, 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缓慢。

毛泽东是深深了解中国国情的。他希望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找到一条共同富裕的道路, 迅速富裕起来。1955年10月, 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上指出:“要巩固工农联盟, 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 穷的要富裕, 所有农民都要富裕。”⁴⁹ 但总的说来, 毛泽东对富裕问题的认识有局限性。这表现在: 其一, 不主张太富, 过份强调“穷则思变”的意义。中国古代贤者“食无求饱, 居无求安”的思想对毛泽东影响很大, 故主张“农民要富, 但不可太富。”⁵¹ 在1975年9月会见英国首相希思时, 他说:“中国现在还很穷, 穷了好, 比你们富好, 人一穷, 他就要斗争。”⁵¹ 其二, 平均主义思想严重, 在很大程度上把共同富裕理解为平均富裕。毛泽东把按劳分配原则本身当作资产阶级法权, 并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应加以限制。通过成立人民公社, 取消了工分制, 建立了公共食堂, 吃饭不要钱, 这完全是平均主义的作法。尽管后来他对平均主义作过纠正, 但由于“左”的错误思想指导, 平均主义最终未得到遏制。

邓小平在科学地把握中国的国情, 深刻地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 深入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继承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富民思想, 并摒弃斯大林、毛泽东关于富民问题的错误认识的基础上, 科学地解决了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探索出了一条实现共同富裕的正确道路, 从而丰富、发展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富民思想,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2. 从实践价值看, 邓小平共同富裕观源于实践, 又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

在邓小平的共同富裕观指导下, 我国农村率先冲破平均主义束缚, 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使农民的劳动报酬与劳动成果直接挂钩, 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 带来了农村经济的大发展及农民生活水平的大提高。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又推动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通过实行承包经营、租赁经营等多种形式的责任制, 扩大企业内部的分配自主权, 打破了分配上存在的平均主义, 从而使企业活力大为增强。特别是根据邓小平“部分地区先富”的思想, 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依靠优惠的政策和灵活的措施, 借助地缘优势, 迅速发展起来。并对内地产生了极大的示范作用, 带动了内地经济大发展。这些事实充分说明: 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已成为事实, 先富帮后富, 带动后富的作用已开始有所发挥。

但无庸讳言, 在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出现了地区间经济发展及居民间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如前所述, 邓小平对此问题是有所预见的, 并提出了一些解决的措施与办法。故深入领会邓小平共同富裕构想, 对解决当前存在的贫富差距与共同富裕的矛盾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我国社会是不是已经产生了“两极分化”呢? 总体上看, 改革开放以来, 绝大多数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相当大的提高, 但在提高中也有一部分人的相对收入减少。同时, 我国地区间经济差距扩大也是在各地区经济都取得了长足发展情况下发生的。而且, 我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相比, 贫富差距要小得多。因此, 我国目前存在的贫富差距是发展中的差距, “两极分化”还没有导入我国社会。这也验证了邓小平的结论: 有社会主义制度作保障, 不会出现“两极分化”。

但是, 我们对贫富差距问题不能听之任之, 地区间发展差距过大会影响地区间经济协调发展, 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有许多革命老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及大面积的边境区, 如果听之任之, 地区差距就会进一步拉大, 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就会发展, 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 “就可能出乱子。”²³ 笔者认为, 领

会邓小平富裕思想的精神实质，当前在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实践中应做好两方面的工作：

(1) 不能削弱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活力。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无论从区位条件、自然条件、还是从经济技术基础诸方面看，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在未来竞争中都有明显的优势。在缩小地区间差距中，如果不保持东部地区优先发展，就是无视我国的国情，是不利于发展生产力，从而阻碍共同富裕的进程的。

(2) 加大中央对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扶持力度。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可以采取多种措施，如中央政府运用宏观调控，逐步从发达地区多收一点税利，转向中、西部地区投资，以加强那里的资源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理顺资源型产品价格，增强中、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加强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对口支援，开展横向经济联合，在资源条件、产业结构、资金和技术上实行优势互补。同时，中、西部地区的群众，努力增强市场经济意识，利用资源丰富、劳动力充足、市场广阔的优势，凭借建国四十多年积累和创造的条件，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必然会使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加快。

总之，只要我们以邓小平共同富裕观为指导，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就一定会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注释：

- 12 13 14 15 16 23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157、172、255、123、63、364、166、11、172、149、64、139、374、364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 11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142、98、222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7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12、13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9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197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20 《斯大林全集》，第 13 卷，316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1 22 韩荣璋、曲金彪：《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国特色的成功之路》，101 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曾国安)

(上接第 34 页)

- 16 列宁：《论粮食税》，见《列宁全集》，中文 2 版，第 41 卷，217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7 列宁：《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见《列宁全集》，中文 2 版，第 43 卷，278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8 列宁：《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见《列宁全集》，中文 2 版，第 40 卷，137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9 列宁：《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见《列宁全集》，中文 2 版，第 42 卷，245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20 列宁：《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报告》，见《列宁全集》，中文 2 版，第 42 卷，225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21 列宁：《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文献》，见《列宁全集》，中文 2 版，第 42 卷，347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22 列宁：《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见《列宁全集》，中文 2 版，第 42 卷，365~ 366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23 列宁：《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见《列宁全集》，中文 2 版，第 42 卷，7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24 列宁：《全俄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文献》，见《列宁全集》，中文 2 版，第 34 卷，108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5 列宁：《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见《列宁全集》，中文 2 版，第 37 卷，348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6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400 页，莫斯科，外文书籍出版局，1949。
27 斯大林：《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见《斯大林全集》，中文 1 版，第 8 卷，112~ 113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杨宗传)